

英国工党的 民主社会主义 经济纲领

〔英〕彼得·诺兰 苏珊娜·佩因 等著

章宗炎 杨玉生 林木西 杨哲英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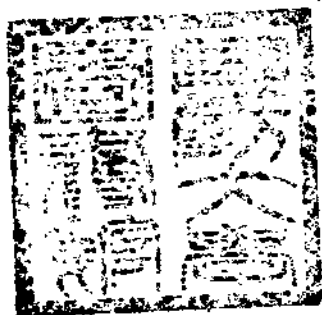
陕西人民出版社



英国工党的 民主社会主义经济纲领

〔英〕彼得·诺兰 苏珊娜·佩因 等著

章宗炎 杨玉生 林木西 杨哲英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 玉 米 祥

封面设计：马山人

版式设计：田慧君

英国工党的

民主社会主义经济纲领

〔英〕彼得·诺兰 苏珊娜·佩因 等著

章宗炎 杨玉生 林木西 杨哲英 译

陕 西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发 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昆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5 印张 244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 7-224-01227-0/F · 133

定 价，5.25元

60-11-05

译者的话

一

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以外，世界上还有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是其中的一种。从1945年以来，英国工党曾先后四次执政，在其执政的17年内，曾推行了一系列大致可以将其纳入“民主社会主义”范畴的政策。

对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作为与英国保守党抗衡的重要力量，英国工党在战后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政策主张和某些改革措施，对英国国内外经济关系的调整 and 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是最早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最早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早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英国这座“世界工厂”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①。《资本论》是以英国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的。马克思说：“到目前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为例证。”^②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了系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38页。

统研究^①，对英国的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寄予厚望。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在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②

尽管后来的革命发展进程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料的那样，在英国、法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而是在苏联、中国等经济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没有“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而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得以实现；英国的工人运动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英国至今尚未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的羁绊。然而，在《资本论》发表100多年后的今天，英国的经济政治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发展状况如何？它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有哪些利弊？它对英国经济关系的调整 and 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进言之，英国工党所自诩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和分析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and 社会主义道路，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看，《英国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一书对我们有一定参考价值。

①参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资本论》有关部分。

②恩格斯：《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7页。

《英国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一书是英国一些左翼经济学家对长期以来英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重新思考的产物。本书一方面批判了英国现今流行的右翼经济学家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以及撒切尔政府的一些保守主义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也探讨了在英国进行“民主社会主义”的“试验”所必须采取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

长期以来，工党人士一直期望通过实行一套以国有化、需求管理和公平的收入分配为基本特征的理论和政策，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经济周期波动、生产无政府状态和贫富差距悬殊等弊端，并实现英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但事与愿违，战后英国经济的发展证明，英国工党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非但没有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经济稳定增长，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英国经济反而大大地落后了，在国际市场上丧失了以往较强的竞争能力。政府、企业、工会“三伙伴关系”协调的软弱无力，改良色彩的各种结构改革的无济于事，通货膨胀——失业并发病与国际收支危机的交织并发，所有这些，都使人们对英国工党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开始产生怀疑和动摇，甚至丧失了对工党的信任。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来，英国工党在大选中接连败北，促使英国左翼人士不得不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进行重新思考，包括对一些基本理论和改革措施进行反思，以求在英国“复兴”“社会主义”。80年代，英国

左翼人士展开了各种形式的研究和讨论，并逐渐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在《英国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一书中得到了反映。

在这本书中，左翼经济学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了讨论：

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是大量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本书作者强调，必须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合理确定各自调节的范围：计划调节不能超越主要的客观经济变量，如就业量、总收入、投资份额等，同时通过税收和补贴引导企业作出理性的选择；市场则通过企业的竞争活动决定产量结构和相对价格。他们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模式称为“市场社会主义”。

如何将充分就业同相对低的通货膨胀联系起来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所采取的一个对策，就是收入政策。针对工党政府所面临的大量潜伏的通货膨胀危险和工资及其它收入要求方面的问题，本书作者主张，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而不是采取徒劳无益的手段处理货币工资议价过程中的表面现象。

在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上，本书作者对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学说重新进行了评价。他们认为，虽然凯恩斯提出的国家干预市场以维持有效需求和就业水平的论点至今仍然有效，但凯恩斯的预期形成观点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为他把预期看成是外在决定的，而不是在分析行为的过程中产生的。实际上，应当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机能以及历史的研究中衍生出关于预期形成的方法。因此，为了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以宏观为基础的全盘的需求管理必须补充以复杂的干预，包括

工业结构和金融结构的调整，即所谓“结构凯恩斯主义”。

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本书作者认为，英国工党应当克服民族主义的态度，正确认识英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及其与其它工业国家的相互联系。与此同时，应首先通过实行恰当的产业政策增强本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增强制造业部门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同时，本书作者还深刻批判了右翼经济学家和保守党政府的自由放任的理论和政策。他们认为，自由放任主义并不能解决英国现时的经济问题，而保守党政府所面临的大量失业、资本外流、制造业基础的长期剥蚀等问题，都是深刻的结构性缺陷。撒切尔主义没有能力实现其所坚持的自由选择、相互援助、自力更生等自由主义的价值。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维护相互援助、民主责任和对国家权力限制的自由观念。

此外，本书作者还提出了需求创造、扩大公共部门就业、货币贬值和最后求助于“雇主”作用的设想等一系列政策主张；建立国家投资银行、国家和地方企业委员会、地区议会和国家就业委员会等制度的建议；采用双重汇率、信用控制和未来的应急手段等设想。本书还拿出一定篇幅专门讨论了“自由和国家”的问题。

三

应当承认，英国左翼经济学家的许多分析是比较客观的，有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是较为深刻的，某些建议和设想不乏合理之处。由于本书作者是站在英国保守党的对立

面，亦即“成熟的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对立面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暴露出英国社会当前存在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矛盾。他们针对英国时弊而主张采取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也为我们研究比较经济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但是，应该看到，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同我国和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毕竟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是否坚持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在于是否实行了某些经济政策，更主要地取决于这种经济制度的基础如何，即是否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而这一点恰恰是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的致命弱点。尽管英国工党也主张实行“国有化”，并把这一政策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作为在英国进行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但它并没有真正触及到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在收入分配方面，工党人士虽然也提出了缩小差别、消除性别歧视、实行财政补贴等政策，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按资分配”的性质，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此外，英国工党所主张的“经济计划化”、“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市场社会主义”，与我们所坚持的“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也根本不是一回事。

同时，英国工党所主张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革措施，也与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很大的区别。进入20世纪以来，英国经济遇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工党和保守党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都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全体

选民只是定期地把政府从这个党的手中转移到另一个党的手里，没有一个政府能保证充分就业、稳定增长、低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顺差。左翼经济学家在本书中虽然为工党政府提供了新的改革“处方”，但这些改革措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只不过是对于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生产关系的重新调整，它与我国所进行的旨在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体制改革，显然不能相提并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作者们并不是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分析英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其分析和论述难免有偏颇之处。例如，他们对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国家学说的比较，关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定义与社会经济现实矛盾的看法，等等，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因此，请读者在阅读本书时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出自己的正确判断。

译者

1989年11月25日

致 谢

本书起因于剑桥大学耶苏学院剑桥经济学杂志于1985年6月组织的一次讨论会。该讨论会被冠以“为英国社会主义政策探讨新的基础”的标题。除了其文章收进本书的那些人，我们还要感谢下面的参加这次讨论会的人：菲尔·布莱克本、伍洛德吉米尔兹·布鲁斯、塞巴夏诺·布鲁斯克、保罗·克里根、肯·库兹、科林·克劳奇、约翰·伊特韦尔、安德鲁·格林、罗依·格林、格雷厄姆·古德金、杰夫·哈考特、约翰·哈里森、简·汉弗莱斯、杰夫·英厄姆、雷·乔布林、加文·基钦、托尼·劳森、约翰·洛依德、卡西耶·马尔斯、拉尔夫·米利班德、里查德·米恩斯、罗杰·穆尔、鲍布·摩根、帕斯卡尔·佩蒂特、戈兰·泰尔鲍恩和希拉里·温莱特。本书是由彼德·诺兰和苏珊娜·佩因根据剑桥经济学杂志编辑的。

本书是由在这次讨论会上宣读的那些论文构成的，按照编者的看法，这些论文为当前的争论提供了一个一致性的贡献。不应当把这些论文看作是对参加这次讨论会的人集体观点的表述，也不应看作是剑桥经济学杂志编委会观点的表述。

编者愿意感谢安·牛顿，他协助组织了这次讨论会并协助编辑了本书。

英文版前言

这本独创性论文集的一个基本意图是为英国构筑新的政治经济战略。本书深刻地批判了新右派的简单化的自由概念及其自由市场有解决经济问题能力的信条。可是，本书也强调应彻底地重新评价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对待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态度。本书认为，正确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政策能够在当前的技术进步和国际分工趋势中取得优势，以造成经济增长、降低失业和增强对整个政治经济过程的一般控制。

1983年在英国工党遭受大选失败的困境中，英国左派陷入了混乱。这次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工党的因体力劳动工人阶级就业下降而丧失的社会基础来解释，或者由报业新闻界的敌视态度来解释，或者由“福克兰群岛因素”来解释。可是，许多左翼分析家认为，主要因素是长期增长起来的公众对工党的理论和政策的不满。他们认为，公众对工党的传统说教已经大不以为然了。人们感到国有化的工业是无效率的，并且需由国家补助来保护其在市场上失败的结果；人们感到，国家经营的福利事业是家长制的和不民主的；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则被认为要对高通货膨胀负责和它不能解决（实际是助长）深刻的结构问题；有组织的劳工对工业运行实际的控制被看成是英国相对落后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工党同工会的紧密的关系妨碍了它处理变化着的运行实际、结构改变的主要过程和确立大量的收入政策中的问

题。工党同工会的紧密联系表明，这使工党失去了对没参加工会的大多数居民（包括大多数家庭主妇、青年和非白种人口）的影响。他们得出结论说，不重新评价工党的理论和政策，工党就有陷入急剧衰落的危险。

促使对英国左派理论重新思考的并不仅仅是工党大选的失败。多年来，英国社会主义者中越来越多的人对长期支配左翼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日益不满。从前，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相信建立国家支配经济的可能性。认为这种国家支配经济可以通过对资源分配的彻底直接管理的自觉社会控制，来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人们觉得，这就会造成一个美妙的社会和更快增长的经济。对战后英国政治和经济纪录批判的思考趋向于挖掉这个信条的基础。更基本的怀疑是由于对共产主义经济的分析而产生的。共产主义经济的集中化的行政计划体制在70年代晚期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这向这些国内外的经济学家表明，要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必须进行基本体制的改革，引进市场力量的强大作用。另外，在70年代和80年代，通过对左派观点大量批判的研究，使西方社会主义者和公众对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所固有的非民主的潜在性的认识进一步强化了。波兰的危机和团结工会的兴起及衰落，生动地表明了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80年代初，席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规模的体制改革也给了西方社会主义者的思考以更强有力的震动。中国的经济学家处在一种理论探索的状态中：他们放弃了旧的全面的国家计划的简单信条，但是同样还有对非控制的市场力量释放的认识问题。从前简单的社会主义信条已经被社会主义术语的确切含义的热烈讨论所代替。

这些因素的发展已经导致在已过去的几年中，英国社会主义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再思考，而且一个新的、联贯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开始形成。许多英国社会主义者承认，市场社会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正在作为将来政策的基础代替旧的国家拜物教的僵化教条。

在国内，远在五年以前，一些基本问题就已经以一种难以想象的方式重新评价过了。可是，在国际领域内，却缺乏相应的进展，政治经济学家的国家主义仍是至高无上的，虽然也象征性地对国际配位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及贸易有所表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本书有一个确定的国际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若分析是真实的话，必须重新认识近年来的戏剧性变化。它认为，这些变化代表了新的机会，不应当仅仅把它们简单地看作是对国家自由行使权力的一种新的约束。

实际上，社会主义者与普通社会科学家一样经得起剖析。但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广泛的：社会主义首先应当发展人的自由，发展每个人尽可能实现其潜在能力的自由。无论人们对这个目的的不同方面进行可取的平衡后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例如，人们可能认为达到长期社会主义目的最好的途径是使一切政策从属于国民产量和收入的最大增长），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不系统地调查分析不同部分——经济、政治、社会等等——间的关系，似乎是一种灾难。无论某一学科内的某种分析是多么精确，社会主义者的最终目的却是把对社会的分析纳入到某种一贯的总体中。相应地，本书所包含的许多东西是狭义的经济性质的，但其总体观点是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不仅因为大家相信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起到了

较好的经济学作用，而且，这样一种参考结构对于社会主义的分析也是十分重要的。

与这种方法相一致，本书第一部分考察了基本的政治原理。这一部分证明，社会主义就是要限制个人的自由和权力以发展集体和社会的权力的观点是策略上和理论上不堪设想的国家主义的遗产。集体的和社会的权力使个人的权力扩大，而且它是分享任何自由制度的前提。它认为，社会主义政府应当支持使国家和文明社会民主化的各种措施。政治民主化应当是社会主义政党的基本目标，而且，民主也并不随地方和国家的选举的完结而完结。本部分还更为注重实地探讨了经济目标 and 政治目标间的策略上的关系。它认为，新的工党政府组阁的初期，追求民主化的步子应当谨慎一些，应当优先确定有效的经济增长的政策。

本书第二部分从分析市场和计划间的关系入手继续考察其基本原理。它认为，社会主义政府应当对加强市场力量、企业及其赢利采取肯定的态度。它应当在进一步为市场失调的许多领域确定变化方向和补偿制度的同时，认识市场力量的永久性，不应当把它们看作是暂时的、过渡的现象，直到在应该以克服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的全面计划的形式引进真正的社会主义之前，应当容许它们存在。英国社会主义者必须最终肃清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这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化（从其政治缺点出发）在实现大多数人向往的经济目标（生产力的增长和生活水准的提高）上是有效的。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英国变种的结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一种鼓舞，也不是英国社会主义者所应当追求的东西。

第三一七部分主要用于分析新的政治经济政策（同主要在第一、二部分涉及的原理的讨论相反）。

在很长时期内，左翼的关于经济政策的观点遵循了（并且仍然是）下面的线索。经济增长被视为主要取决于需求管理；若需求是充足的话，供给方面就将自我实现。它认为，金融界忽视了对企业发展的财政支持，应由社会主义政府对银行实行国有化。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潜在地是极不稳定的，因此感到，社会主义政府应当建立广泛的贸易壁垒，全面地控制资本的流动。它认为，收入政策至多应当是政府和工会间自愿协商的事情。

近年间，有一个小的但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团体，该团体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一理论趋势的合理性提出了疑问，其中许多人的思想已包含在本书中。他们认为，经济复兴战略中心必须是发展参加国际竞争的制造业部门。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就业机会（主要在非制造业部门）。社会主义政府需要寻求新的制度——国家的和非国家的，全国性的和地方的——以补充和影响多方失灵的市场，特别是补充和影响引导长期工业重点的市场。本书认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仍然同刺激产量和就业的增长有关。但是，若英国的制造业面对新形式的国际竞争（和价格相比，更以产品为基础）要成功的话，就必须把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同产业措施和财政政策结合起来，这在80年代是非常重要的。过去的城市工业投资的失败及其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已被公认了。但是，金融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而且它的许多活动是对经济的有益的贡献。对本书做出贡献的人一致认为，工党不应当像许多左派人士认为的那样牺牲金融业。需要新的金

融制度是为了促进工业的发展，需要新的调节是为了控制城市活动的显然不合意的方面。但是，对金融的全面控制就将造成清理成本（不少同外国资本的流入有关）和不明显的收益。本书还认为，若有一个有效的收入政策（这种收入政策的新形式在第七部分分析）和有选择的进口管制（全面的进口管制因将阻止结构变化而被避免采用），就将可能成功地限制通货膨胀。经济战略强有力地确定在供给方面，但是采取了一种肯定的、向上伸缩的方式，这种方式同新右派供给经济学的否定的、低工资的向下伸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本书的多学科的论题在分析经济和政治间联系的国际关系上（第3.1章）时被继续下去了。在这里，认真研究了由于迅速发展的国际网络和政治联系而对英国经济领域活动自由的限制。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由此提供的、集中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新的可能性。

这个分析线索在第六部分进一步展开了。本书的一个反复出现的论题是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的联系，后者是供给方面首创性的基础。第六部分主要致力于某些基本的微观层次的制度问题。技术的变化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并转变为家庭环境和工作环境。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技术的变化明显地意味着工作量的减少。可是，很可能是（像第6.3章所认为的）我们现在正处在按照一种有利可图性同增加工作满足相结合的方式大规模转变劳动过程的边缘上。虽然不能假定这种改变没有社会主义政府的活动会自动地发生。这个领域是不固定的和复杂的，在这里，清楚说明了精确的政策建议。可是，这是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以致于按这个方向考虑就一定是将来社会主义政策的中心吗？关于工人合作社和工